

80 后知识精英：多元分割与动态流变

施芸卿

内容提要 中国特定的转型背景从 80 后的代际共性和代内分化两个层面体现出来的是动态的社会变迁和静态的社会结构在具体型塑一代人时的张力，构成 80 后研究的现实意义。结合动态社会变迁的背景，作为静态社会结构的直接体现的先赋因素，它的分化机制体现在两个层面：代内分化与代际分化。本文基于 6 所 985 高校（精英大学）80 后大学生数据，以先赋性/获致性因素的作用机制为视角，考察中国 80 后知识精英内部的多元分割状况及其可能的动态流变趋势，发现：1) 对同一代人而言，先赋因素的代内分化模式在个人生命历程的不同时点上不同。2) 对不同代人而言，先赋因素的代际分化模式要结合社会变迁的背景考虑，折射出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

关键词 80 后 先赋性 获致性 代内分化 代际分化

施芸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100732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80 后”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最初出现在文坛，后被推及至全国出生于 1980-1989 年的一代^[1]。据统计，中国在这 10 年间出生的人口共有 219,611,563 人。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构成了 80 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们成为备受争议的“转型的一代”。

在媒体话语里，80 后一直是一个含义明确的讨论范畴，有学者通过对 2003 年至 2008 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 14 种主流媒体对 80 后的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 80 后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负面到正

面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另类”、“自我”再到“自信”、“社会责任感”、“爱国”，从“垮掉的一代”到“鸟巢一代”（王芳，2009）。受权力主导的媒体话语转变的背后原因是复杂而深层的，80 后自身长成并开始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参与和发声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在主流对这代人的评价也日益主流化，并由此逐渐淡出公众争议后，我们却要追问，“80 后”能否在研究上也构成一个真问题的范畴？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诸多特点，是会随着青年期的渡过而消失的青年本身的特点，还是确实实有着由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阶段所赋予他们特定的生命历程的独特内涵？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80 后身上所展现出来

的,不仅有古今中外青年作为人生过渡期的普遍特质,还有中国特定背景刻下的独特烙印,分为动态社会变迁产生的代际共性以及静态社会结构塑造的代内分化两个层面:

1. 代际共性 较之其他代,80后是一个内在矛盾凸显的群体,由其所在的特定社会变迁时点所决定。与之前几代相比,他们是改革之后的第一代,而与后几代相比,他们则成长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的初期。他们听着市场经济宣传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实践着计划经济而长大,两种体制的并存、纠缠与渐变,使他们总是处于一个尴尬且自我矛盾的境地。黎玉娴从建立现代规范与教育国家化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80后”虽然生长在比以前更多选择的开放社会,却不得不同样被拢集在学校这一现代教育机构里,走入已经安排好的标准化成长轨道。但是开放的社会又使他们得以接触、吸收各种思想文化,于是“80后”对教育体制的反应一方面是在现实原则下服从于父辈的意志和国家权威,另一方面是内心深处的质疑和言行的叛逆表现(黎玉娴 2007)。在“80后”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个体独立性的“闪婚”与强调个体依赖性的“啃老”竟然能悖论式地同时发生,张杰将其解释为转型之中的父子关系从单向权威到单向庇护的变迁(张杰 2008)。80后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矛盾性的本质,是动态的社会变迁带来的、通过不同渠道(如教育、体制内外的单位类型、消费、网络等)作用在80后个体身上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力量本身的矛盾。

2. 代内分化 80后是一个多元分割的群体,城乡二元结构,来自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经由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为中介,将这个群体内在划分为很多个子群体,使他们的生活状态迥然相异且相互隔绝,最典型的如大学生80后群体和农民工80后群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点,却仿佛置身于两个世界。这种多元在个体身上体现为各种机会的不平等(教育、就业、发声),而若放置于转型的视角之下去理解,社会格局对人口的年龄层和知识层的分割,又内在的成为了市场化过程中资本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正如陈映芳所指出的,这一根本逻辑源于“人”被“人力”化,不同年龄层的劳动力和消费能力,正被各种力量精心地计算并实现其利益最大化(陈映芳 2010)。

从代际共性和代内分化两个层面体现出来的是动态的社会变迁和静态的社会结构在塑造具体的一

代人时的张力,使我们不能将“80后”作为一个简单的标签、不加区分地、静态孤立地来理解,而是要将其立体地置于历史的和个人的时点之下,并将历史还原为包含社会结构及变迁阶段的具体境遇,个人还原为具体的应对态度和行动策略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改革开放的特定产物,他们身上交融着的不仅是青年期的特征,更有社会变迁的烙印,并构成我们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80后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在已有的80后研究中,媒体的讨论多关心其代际特征,或转型因素带来的群体性格(价值观上的个体性、接受新事物意识能力强、思维独立有批判精神等)(黄洪基 2009);学术研究则习惯性地将这个群体分为多个标签化的子群体讨论,例如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及独生子女群体。这种划分将80后代内分化简单化,尤其是在媒介话语的眼球导向下(如各种“族”和各种“奴”),导致关注过多地集中在某个具有标签化特征的子群体内部而忽略了对造成分化的机制的探讨。总体来说,关于80后的研究很多,但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很少。究其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地把上述动态的社会变迁与静态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纳入对这一代人的具体考量。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针对80后青年的大型专项研究比较少,大样本的研究一般基于全国综合调查,以筛选其中的同期群为基本的分析策略,而小样本研究较多,或以某校、某一地区的抽样调查为例,以研究生或者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表现;另有部分国际比较研究,常以中日韩青年为比较对象,关注其公民参与现状(闵学勤 2010)或身心健康的指标、现状和影响因素(雷开春等 2011)。此外,调查的实施机构也五花八门,学术机构及商业机构不一而足。由此,大型专项研究的缺失导致被以80后为主体的被研究者的特性和自主的声音无法全面展现,而这对于处于社会变迁和人生过渡期青年的意义尤为重要。

(二)多元分化机制:先赋性因素的视角 二战后兴起的中观理论,以社会分层理论为最主要代表,找到了一条连接宏大社会结构与个人各要素相关联,且可被实证和量化的通道。对先赋性因素作用及其作用模式的关注,是社会结构诸要素在个人层面最直接的体现,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布劳-邓肯的

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综合了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两种方式,考察个人的出身背景和后天获得的教育和能力对个人最终能达到的职业及阶级地位的影响,认为人们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后天努力(获致因素)。不过,不同于西方分层研究兴起之时已然相对稳定且开放的社会背景,中国当前处于史无前例的巨变之中,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和“静态”之间的张力,从而影响社会流动与社会不平等的机制,构成中国研究与西方研究截然不同的起点,也影响到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那么,在西方文献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的转型历程中是否已然改变?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又如何透过转型的历程继续发挥作用?已有不少学者以社会流动和社会不平等为基本关注点,对此作了解答:

高勇指出,西方代际流动研究中“地位获得”范式与“阶层流动”范式背后存在的两个强假设是从时间维度上的静态社会结构背景和从空间维度上的同质变化趋势。但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并非发生在坚实而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因此,代际流动是一种“双重流动”,不仅是“流动的藩篱”,更重要的是“藩篱的流动”(高勇 2009)。李春玲则以高校扩招作为转型中出现的影响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事件,分析高校扩招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指出,扩招并未如人们想当然以为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机会而降低了教育不平等,阶层、户籍身份、民族等先赋性因素依旧在数量和质量上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发挥着重要作用(李春玲 2010)。李培林和田丰的一项研究也强调了由社会转型体现的代际因素(新生代)和由社会结构体现的阶层因素(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处境、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及收入、社会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李培林、田丰 2011)。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洞悉转型与结构之间、社会设置与个人体验之间时刻处于演变与互构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灵感。若将问卷上的数字还原为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的人生,从出生、入学、就业、成家,出生于中国第三次婴儿潮的 80 后,经历的是一个层层闯关式的马拉松长跑过程,不同阶段掉队的不同部分被配置到不同的社会位置中,构成 80 后多元分化的局面。由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在“转型的一代”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各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它在不同的

个人时点和不同的社会时点上的作用模式是否相同?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选定为接受过重点大学培养的(985 高校)80 后群体,出于几方面的考虑:1)985 高校身份意味着这部分 80 后已经历层层闯关,获得了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及最高质量的向上流动凭证,形成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那么此后,先赋性要素是否依旧重要?在何种层面及何种程度上能被获致性因素所取代?2)知识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权力维度,高等教育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大学是各学科领域前沿知识传授和生产的场所;另一方面,大学独特的体制、环境和日常生活安排,也是培育现代公民的基本场所,且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渠道还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基础设置,联结社会 and 个人的过去与未来。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伴随着与西方相反的筛选制度——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层——的日益严格化(李春玲, 2010),导致 985 重点高校与一般本、专科院校占据的资源相差巨大,使上述知识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的分化加剧。本研究以 985 高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为研究总体,假定这部分 80 后中的知识精英群体,掌握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获致性因素,与其他子群体在各方面体现出差别,而他们的境遇和态度,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2]。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以 985 高校 80 后在校生群体为讨论主体,对照部分 985 高校 90 后在校生数据以及 985 高校 80 后毕业生数据^[3],从两个方面讨论先赋因素对知识精英群体的多元分割作用:1)从横向静态社会结构来看,先赋因素对各子群体的分割作用在某一代人生命历程的不同时点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模式是否相同?具体来说,先赋因素对 80 后在上大学之前和上大学之后发挥作用的强度和模式是否相同?2)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背景,从纵向动态社会变迁来看,先赋性因素在社会历史的不同时点发挥作用的强度和模式是否相同?具体来说,先赋因素对 80 后和 90 后发挥作用的强度和模式是否相同?

(一)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多组线性、定序及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别从经济生活条件、学业成绩、社会交往和就业预期这四方面来测量多元分割指标(因变量),各指标所包含的具体变量如下:

1. 经济生活条件指标:A 每月可支配的钱数(对

数) ;B 每月日常消费钱数(对数)。2. 学业成绩指标 : A 专业课成绩自评 ;B 外语水平自评。3. 社会交往指标 : A 是否谈过恋爱 ;B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C 虚拟交往状况。4. 就业预期指标 : A 找工作顺利程度(就业自信心) ;B 初职月薪预期 ;C 找不到工作的选择(是否接受暂时啃老)

其中,“社会交往指标”中的三个指标分别从亲密交往、公共交往和虚拟交往三个层面来测量社会交往。本研究将虚拟交往定义为以使用互联网提供的交互和沟通功能为主要目的的网络行为。通过 Mplus 软件对问卷涉及的八种网络行为进行因子分析后拟合得出“信息”、“娱乐”和“社交”这三种网络行为因子^[4],用社交因子作为测量“虚拟交往状况”的具体指标,视为连续变量。

(二)自变量 本研究用以测量先赋因素的持续作用的自变量包括城乡差异(社会二元结构中的位置。以上大学前户口所在地城镇=1,农村=0)和阶层差异。阶层差异从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三方面测量,具体指标分别父母月收入、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父亲职业。父母月收入分为 14 档(500 以下-2000 以上),视为连续变量;父母受教育年限由学历转化为相应的年,视为连续变量;父亲的职业共 23 个细类,综合成 6 个分类,以农民为参照组,设置 5 个虚拟变量。

(三)控制变量 此外,本研究将性别(男性=1)、是否独生子女(独生子女=1)、年级设置(将本科一年级设定为参照组,生成本科二/三/四年级及硕士、博士生 5 个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80 后”群体内部的多元分割 根据 2005 年的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80 后”总人数约为 2.04 亿,占总人口的 15.4%。“80 后农民工群体”和“80 后大学生群体”是其中差异最为分殊的两大群体。据初步估计,农民工占“80 后”总人口的 44%,大学生占 20%,两大群体内部差异如下表 1 所示。

我们以是否经过高等教育为两大群体的标志分割点,本身就体现了先赋因素对 80 后群体代内分化的初始作用。首先,城乡因素对成为农民工还是成为大学生有绝对影响,在 80 后农民工群体中,城镇户口比例为零,印证了户口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强大力量。户口不仅是身份,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紧密相

关是各种资源的分配,对于 80 后最直接的就是教育资源,这点从两大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上亦可得到体现。80 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为 9.5 年,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便走向劳动力市场。其次,阶层因素同样有显著影响。80 后农民工中父亲职业为农民的比例远高于大学生,两者差距为 45.7%^[5]。同时,从农民工群体到大学生群体再到 985 高校大学生群体,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递增 2 年和 1.2 年。因此,先赋因素的分化作用首先体现在决定一代人中的哪些可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表 1 “80 后”内部群体差异

	80 后 总体	80 后 农民 工	80 后 大学 生	985 高校 80 后 大学生	985 高校 90 后 大学生
城镇户口比例(%)	22.9	0.0	67.8	51.9	63.2
独生子女比例(%)	19.1	9.3	48.0	42.8	52.1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	9.5	15 年 以上	15 年 以上	15 年 以上
党员比例(%)	2.5	3.1	10.3	43.1	7.7
父亲职业(%)					
管理人员	3.2	1.1	8.3	12.2	16.4
专业人员	2.9	1.1	8.3	13.0	18.7
办事人员	6.5	1.1	11.5	12.4	15.0
个体自雇	8.2	9.1	11.5	15.7	16.4
工人	23.8	15.1	29.8	11.1	9.3
农民	51.5	71.5	25.2	30.3	18.1
无业	3.9	1.1	5.5	5.3	6.1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6.7	6.3	8.3	9.5	10.6

注:①表中数据统计来自于 200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6 和 2008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的“2010 年 6 所 985 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抽样追踪调查数据”^[6];②80 后大学生和 985 高校大学生的城镇户口比例是指上大学前的户口身份。

表格最后一栏 985 高校 90 后在校生纳入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作为社会结构的先赋因素在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的作用模式。80 后和 90 后相差十年,体现出扩招初期及扩招至今的某些特点。较之 80 后,985 高校 90 后大学生来自城市的比例更大(增加 11.3%);父亲职业地位较高的更多(管理人员增加 4.2%,专业人员增加 5.7%,办事人员增加 2.6%,个体自雇者增加 0.7%),父亲职业地位低的更少(工人减少 1.2%,农民减少 12.2%),而且是职业地位越高增加越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职业地位越低减少越多(农民);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长(增加 1.1 年)。这有力地体现出,从 80 后到 90 后这十年中,先赋因素的分化力量在强化,意味着对于先赋性资源较弱的

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在逐渐闭合。

可见,结合动态社会变迁的背景,作为静态社会结构的直接体现的先赋因素,它的分化机制体现在两个层面:代内分化与代际分化。前者是先赋因素对处于同一社会时点下的同一代人内部的分化,这将是我们要重点探讨的部分。后者是先赋因素对处于不同社会时点上的代际群体的分化。由于当前 90 后尚处于刚进入大学的时段,固无法有详细材料充分展开。

(二)代内分化:先赋因素的持续分割 从上述各子群体比较的数据表明,以上大学为分界点,先赋因素在能否上大学时已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那么,进入大学是否便意味着一个较为平等的起点?先赋因素会否持续发挥作用?作用模式是否与原先相同?它们的影响,在哪些层面容易持续,又在哪些层面更有可能被获致性因素所取代?这是本文试图着力阐明的的问题。

1. 经济生活条件⁷⁾。经济生活条件是我们考察先赋因素持续发挥作用模式的一个重要层面,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独生子女和年级后,城镇户籍身份对每月可支配的钱数有显著影响($B=.051^{**}$),却对每月的实际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阶层因素上,父亲职业对在校生的经济状况有显著影响。在模型一中,父亲职业从高到低对可支配钱的多少有顺次的影响。其中,父亲为管理人员的每月可支配钱数的对数比父亲是农民的多 21.2%($B=.212^{***}$),与父亲是其他职业的差距也比较大。但模型二中,父亲为个体自雇的子女每月的实际花销($B=.207^{***}$)与父亲为管理人员($B=.236^{***}$)接近,皆高于其它几项,不按照父亲职业高低顺次排列。家庭经济资本对在校生的经济状况有显著影响,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比起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在校生的经济状况的影响更显著(模型一: $B=.007^{***}$;模型二: $B=.007^{**}$)。

从中可以看出,先赋因素对在校生的消费能力上有比较大的影响,但在校生的日常实际花销在一定程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因为校园生活创造的是一个较为统一和均值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从而使具有不同家庭背景 80 后在校生在消费结构差别不大。先赋因素对在校生的经济状况的影响更有可能表现在拥有的一些比较时新的电子产品上,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在进一步的方差分析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城市户籍对数码相机($P=0.001$)及

PSP⁸⁾的占有($P=0.058$)有显著作用;父亲是管理人员对笔记本电脑($P=0.033$)、数码相机($P=0.002$)、数码摄像机($P=0.070$)、MP3($P=0.004$)以及 PSP($P=0.038$)的占有有显著作用;父母的学历对数码相机($P=0.051/P=0.002$)及 PSP($P=0.000/P=0.000$)的占有有显著作用;家庭经济条件对上述各种电子产品的占有都有显著作用。而台式机占有中先赋因素的作用已经不明显,说明台式机已成当前大学生在校正常学习生活的基本需要。

可见,先赋因素对于在校生的经济条件的影响,已经脱离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层面,转而进入更间接的生活学习的硬件条件方面。

2. 学业成绩⁹⁾。以学业成绩指标为因变量作定序回归发现:先赋因素的不同方面影响学业成绩的不同层面,且影响方式(正/负)不同。城镇户籍身份以及家庭社会资本对在校生的专业成绩(模型三)有负面影响:来自城市的在校生($B=-.142^*$)比来自农村的在校生的(参照组)专业成绩差;相比父亲为农民的在校生的(参照组),父亲为管理人员($B=-.227^{**}$)、专业人员($B=-.351^{***}$)、办事人员($B=-.477^{***}$)、个体自雇($B=-.285^{***}$)以及工人($B=-.253^{**}$)的专业成绩都更差,即父亲为农民的在校生的专业成绩最好;家庭文化及经济资本对在校生的专业成绩没有影响。在英语成绩(模型四)上,城乡不存在显著差异,父亲职业的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父母受教育年限(父亲 $B=.030^{**}$;母亲 $B=.026^{**}$)以及父母收入($B=0.057^{***}$)对其都有显著正相关。综合来说,家庭社会资本越低,在校生的专业成绩越好,家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越高,在校生的英语成绩越好。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结果,先赋因素同时发挥的两种相互矛盾作用应与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在当下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不同意义关联来考虑。先赋资源较弱的在校生的(农村户籍、父亲职业地位低)危机感更强,在学习上更努力,其专业成绩明显优于先赋资源较强的在校生的(城市户籍、父亲职业地位高),这说明专业成绩是一个获致性因素发挥空间更大的领域,相形之下,外语成绩则依旧体现出对先赋性文化资本及经济资本有很强的依赖性,这是一个获致性因素发挥空间较小的领域。结合当前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的基本现实,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对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体现学生在大学传统教育领域中所取

得的成就,能说明个人资质和勤奋程度,但并不是用人单位考量的直接标准(尤其是不在个人专业领域就业的大学生),但英语水平则对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有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对进入收入较高的外资企业。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模式进一步体现了先赋因素在学业成绩中间接而隐晦地持续发生作用的方式。对于先赋资本较弱的学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以专业成绩为代表的较为传统的能力,从而增加自身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在英语成绩为代表的更具市场竞争力的能力上,则依旧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的经济资本的制约,影响着他们获取更好的工作。

这与我们从毕业生数据中得出的发现相吻合。分析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先赋因素对“是否有工作”、“是否失业”以及“是否两个月能找到工作”影响不大,即先赋因素对985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影响不明显,说明就业情况已经一定程度上被获致性因素所改善;但对其第一份工作的收入影响很大,以月收入对数为因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父亲受教育年限 $B=0.039^{**}$;母亲受教育年限 $B=0.014^{**}$),以及父母的月收入越高($B=0.000^{**}$),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月收入也越高。

3. 社会交往状况^[10]。从亲密交往、公共交往和虚拟交往三个维度的先赋因素对985高校80后在校生社会交往进行测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城市户籍对在在校生亲密交往($Exp(B)=1.192^{**}$)和虚拟交往($B=.026^{*}$)有显著正向作用。父亲职业对公共交往和虚拟交往有显著正向作用,较之父亲职业为农民,父亲为个体自雇的孩子最有可能成为学生干部,比参照项多40.5%^(***),而父亲为办事人员的孩子,花最多的时间虚拟交往($B=0.091^{**}$)。父母月收入对亲密交往和虚拟交往有显著正向作用。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长,孩子在虚拟交往上花费的时间越多,而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孩子谈恋爱的可能降低到原先的97.3%^(**)。

比较之下,三种交往行为中,虚拟交往是受先赋因素影响最大的一类,城乡身份、家庭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本都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它较难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然而虚拟交往还意味着对新兴技术的熟悉程度,并能构成青年对这个全球化的剧烈变迁的适应性的重要方面,影响着

他们长远的发展。此外,公共交往相对来说受先赋因素的影响较少,它仅受父亲职业的影响,父亲职业为个体自雇的在校生更可能担任学生干部、参与公共交往,这应该与他们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系。另外,先赋因素对亲密交往的影响体现在城乡差异、家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上,其中文化资本有负面作用,体现出家庭依旧将在校生视为未独立的个体,经济上的支持以及管教上的约束同时存在。

4. 就业预期。先赋因素对985高校80后在校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分别从就业信心^[11]、找不到满意工作时的对策^[12]以及期望月薪^[13]三方面来衡量,统计结果发现:户籍身份对在在校生就业预期影响显著,但与一般经验不同,城市户籍对找工作的信心($B=-.215^{***}$)及期望月薪($B=-.039^{**}$)负相关,即来自农村的在校生对就业更有信心,并且期望月薪更高;在找不到理想工作时的对策中,在“先不工作,继续求学”和“继续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这两项的比较中,城市户籍的在校生更有可能选择后者($Exp(B)=1.332^{**}$)。有趣的是在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在在校生就业信心有显著正相关作用;在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对策时,在“接受不满意的工作”和“继续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两项比较中,父亲教育每增加一年,孩子选择后者的可能为原先的97%^(**),即父亲学历越高,孩子越有可能暂时向不满意的工作妥协;在“先不找工作,继续求学”和“继续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两项比较中,母亲学历每增加一年,孩子选择后者的可能为原先的104%^(**),即母亲学历越高,孩子越有可能坚持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此外,父母的收入对就业信心($B=0.022^{***}$)及期望月薪($B=0.015^{***}$)有显著正相关作用。父亲职业对在在校生就业预期影响不大,以父亲是农民为参照,若父亲是管理人员,对在在校生就业信心有正面影响($B=0.200^{*}$),若父亲是工人,在校生期望月薪对数增加5.1%^(**)。

总体来说,先赋因素的各个部分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比较均匀。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就业信心及期望月薪都较低,这或许可解释为不同户籍身份的80后在校生在感知就业状况时所选取的参照群体的不同。在毕业生数据中,我们发现城乡户籍对985高校的80后的就业机会现实中并没有影响^[14],不过,来自城市的毕业生的收入确实微弱低于来自农村的毕业生,但显著性较低($B=-.090^{*}$)。另外,根据毕业生数据,在实际就业中,父母的教育与父母月收入对毕业

生的实际初职月薪有显著正相关($B=0.000^{***}$)。结合两个数据可推测,家庭经济资本对 985 高校 80 后大学生的影响,无论是预期上还是实际情况上,都是比较一致的,而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则更复杂,亦属于先赋因素较为间接而隐晦的影响方式:可能经由上文所述的电子产品的占有、英语成绩的提高、由虚拟交往显现出来的信息科技的掌握,或者面对不理想的就业时的应对方式,对 80 后知识精英发挥着作用。

五、结 论

依据布劳-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对先赋性/获致性因素的考察的两个前提: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开放。我们发现,当借用先赋性/获致性因素的作用机制考察中国 80 后知识精英内的多元分割状况及其可能的动态流变趋势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先赋性/获致性因素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个人达到职业成就和阶级地位,或曰,使个体得以能动地适应社会变迁,这个过程中发生影响的?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问,先赋性因素的不同层面(城乡身份、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时点和模式是否相同?

通过上文数据分析我们对 80 后农民工、80 后大学生以及 80 后 985 高校大学生各子群体的先赋因素对比,可以发现,在决定 80 后能否进入 985 高校获得当前最重要的获致性资源时,城镇户籍、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即在中国,先赋因素首先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个体获得教育从而提升个人能力的机会。那么在进入重点大学这一相对平等的新起点后,先赋因素的四个层面(城乡身份、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 80 后知识精英群体的经济生活条件、学业成绩、社会交往状况和就业预期这四方面的影响又如何?总体来说,先赋因素的影响持续,但较之上大学之前的影响,其作用模式已从比较直接的方式转向较为间接而隐晦的方式,例如,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更可能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表现出来:在经济层面体现为电子产品的占有(而非日常消费状况);在学业层面体现为更能与劳动力市场接轨的英语成绩(而非传统的专业成绩);在社会交往层面体现为更具高科技含量的虚拟交往模式(而非传统的公共交往);在就业预期层面则体现为对就业信心和找不到理想工作时的对策上。先赋因素的作用模

式的这一转变,也从毕业生数据中得到印证,即对 985 高校的毕业生而言,不同先赋因素的个体就业机会不存在差别,但以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为代表的先赋因素,对毕业生找到高收入的好工作有显著正面影响。

依据布迪厄有关文化资本的理论将精英大学视为统治权力再生产的中介(布迪厄,2004)的论点,本文的数据印证了具有不同先赋型资源的个体不仅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不同,且在精英大学中的适应能力依旧受到先赋性因素的隐形制约。因此,先赋因素在某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的不同时段,发挥作用的模式并不尽相同。同时,若再结合中国社会结构近三十年来的演变趋势,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到,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先赋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时点上对不同代际的作用模式也存在差别。正如已有学者提出的,中国改革至今经历从结构分化到结构定型两大阶段(孙立平,2009)。结合这一背景,80 后接受基础教育的时点大致在 90 年代,还属于改革初期的平等效应释放阶段;而 90 后接受基础教育的时点已在 21 世纪初期,属于资源重新聚拢的阶段,两大不同的社会趋势对具有不同先赋性资源的个体受教育机会的影响,已在本文第一部分对 985 高校中 80 后和 90 后的对比中有所体现,较之 80 后,90 后在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上受先赋因素的影响加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社会结构趋于闭合的现状。但受样本量限制,其影响模式是否与 80 后相同,或以何种方式受社会变迁进程的影响,需留待后续追踪调查进一步讨论。

注释

[1]以十年来计算世代只是习惯使然,临界点之间的差异,实则模糊不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重大社会事件来界定世代更能体现生命历程研究的宏观历史变迁视角。因此,如果从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意义上来说,则“80 后”的界定应始于 1978、1979 年。

[2]整个完整的研究分为在校生和毕业生两部分数据。在问卷及访谈设计上,整个研究参见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侧重被访者的主观行为和态度,突出被研究者的主体性。问卷分为在校生和毕业生两套,针对这两部分群体的不同情况,调查问卷从基本信息、家庭情况、教育经历、就业预期和就业选择(在校生)/就业途径和工作经历(毕业生)、消费行为、网络行为、政治与社会、代际关系、恋爱婚姻和两性关系及工作价值观这十方面做了数据采集。在调查实施上,选取了 6 所 985 高校在调查期间的在校生

6782人,2003-2010年毕业生4655人。6所高校按地区选取,东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各选取1所。调查对象的选取是基于各校目前在校生以及历届毕业生名单进行随机抽样,然后通过email方式联系被选中的调查对象,要求调查对象登录网上调查系统接受调查,当各校毕业生调查回应率达到50%时停止调查。

[3]对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男性和理工科毕业生的应答率明显高于女性和文科毕业生,其它方面则较为接近总体的实际分布。在校生中,男性占65.5%,女性占34.5%;毕业生中,男性占68.5%,女性占31.5%;理工科学生占75.6%,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生占24.4%。为了提高调查数据的代表性,我们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综合类大学毕业的性别比例和专业比例对性别和专业分布进行加权。

[4]在问卷的第六部分,课题组调查了网络行为。以“从不”、“偶尔”、“有时(一周1-2次)”、“经常(一周至少3次)”、“总是(几乎每天)”为五点量表,统计了八种常见网络行为的使用状况,用mplus软件拟合出三个因子:信息因子(浏览新闻、查信息),娱乐因子(下载上传各类视频、打网络游戏)以及社交因子(写博客、聊天、泡论坛、上交友网),拟合模型各参数:Chi-square=2806.834,df=28,P=0.000,CFI=0.865,RMSEA=0.065。

[5]除农民之外的其他职业中,子女大学生的比例都高于农民工,体现出当前户籍身份还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6]“985高校毕业生抽样追踪调查”自2010年开始追踪调查6所985高校(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的4655位2003-2010年毕业生,有关调查方法和数据情况的详细说明参见李春玲和吕鹏撰写的“‘80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

[7]先赋因素对经济生活条件的影响分为两个线性回归模型。模型一以每月可支配的钱(对数)为因变量,模型参数:R²=0.270,自由度=17,样本量=4892。模型二以每月日常消费(对数)为因变量,模型参数:R²=.178,自由度=17,样本量=4876。

[8]PSP Play Station Portable,是一款索尼出的掌上游戏机,在问卷设计时为年轻人中比较流行的电子产品,随后被apple系列的产品取代。

[9]先赋因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分为两个定序logit回归模型(阈值:较差=1,一般=2,较好=3,优异=4为参照组)。模型三以专业成绩自评评为因变量,模型参数:-2Log Likelihood=10721.226,自由度=17,样本量=5203。模型四以英语成绩自评评为因变量,模型参数:-2Log Likelihood=9103.700,自由度=17,样本量=5203。

[10]先赋因素对社会交往状况的测量分为亲密交往、公共交往和虚拟交往三个模型。模型五(亲密交往)以“有否谈过恋爱”为因变量,作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2Log Likelihood=5913.372,自由度=17,样本量=4506。模型六(公共交往)以“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为因变量,作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2Log

Likelihood=7050.785,自由度=17,样本量=5016。模型六(虚拟交往)以对八种网络行为拟合出的“社交因子”为因变量,作线性回归,模型参数:R²=0.1097,自由度=17,样本量=4656。

[11]模型七以“找工作的自信心”为因变量作定序回归,就业信心从弱到强分为三档:就业信心=1.00(比较难找到),就业信心=2.00(不太顺利但是能找到),就业信心=3.00(会很顺利找到)。以取值最大项,即“很顺利能找到”为参照组。模型参数:-2Log Likelihood=7727.32;自由度=17,样本量=5116。

[12]模型八以“毕业后三个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时的选择”为因变量作多元回归,参照项为“继续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3.00),其余两项为“只好先接受不满意的工作”(=1.00)及“先不工作,继续求学”(=2.00)。模型参数:-2Log Likelihood=8605.221,自由度=34,样本量=5111。

[13]模型九以“期望月薪(对数)”为因变量作线性回归,模型参数:R²=.153,自由度=17,样本量=5107。

[14]户籍身份作为自变量,对“是否有工作”、“是否失业”、“是否2个月内找到工作”为因变量的三个回归方程的相应系数都不显著。

参考文献

- [1]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2]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 [3]李春玲:《高校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 [4]黎玉娴:《消费语境里的自我表达》,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 [5]张杰:《“闪婚”与“啃老”——“80后”理性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北京〕《青年研究》2008年第6期。
- [6]陈映芳:《可疑的80后政治意识》,〔北京〕《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 [7]黄洪基:《关于“80后”的研究文献综述》,〔北京〕《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7期。
- [8]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与行为选择》,〔上海〕《社会》2011年第3期。
- [9]雷开春、杨雄:《中日韩高中生的身心健康:指标、现状及影响因素》,〔北京〕《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
- [10]闵学勤:《中日韩青年的公民参与现状及比较研究》,〔北京〕《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
- [11]王芳:《主流媒体上的“80后”形象研究——对中国14种主要报纸的内容分析》,〔北京〕《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 [12]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北京〕《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方心清〕